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的第四屆年會

趙 誠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四屆年會已於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在山西省太原市迎澤賓館舉行。出席這次學術討論會的正式代表爲一百三十七人，列席代表爲六十八人，共計二百零五人。是歷屆年會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次。其中包括來自日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及香港地區的代表十四人：日本岡山大學法文學部好並隆司教授、美國斯坦福大學亞洲語言學系倪德衛教授、美國俄亥俄州大學荆允敬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方語言學系周鴻翔副教授、美國斯坦福大學亞洲語言學系班大爲先生和夏含夷先生、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系高嶋謙一教授、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遠東部許進雄教授、澳大利亞澳洲國立大學巴納教授、澳大利亞澳州國立大學黃然偉博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饒宗頤教授、香港大學中文系單周堯講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研究中心許禮平先生和陳雄根先生。周策縱先生、張光裕先生和鄭良樹先生雖因事未能到會，但仍寄來了學術論文。

本屆年會共收到論文一百二十三篇（包括國外和香港地區的學者提交的十三篇論文），是歷屆年會收到論文最多的一次。論文的內容，從殷墟卜辭分期、銅器斷代、戰國文字考釋到古文字演變規律、上古漢語語法，幾乎涉及到古文字研究的各個領域。大會將這些論文分成五個方面進行宣講並討論。

第一個方面以甲骨分期爲主，兼及卜辭的有關方面，重要的論文如下：胡厚宣《甲骨文麗字說》、張政烺《殷契苜字說》、姚孝遂《牢宰考辨》、高嶋謙一《問鼎》、夏含夷《釋御方》、林澧《小屯南地發掘與殷墟甲骨斷代》、李先登《關於小屯南地甲骨分期的一點意見》、肖楠《再論武乙、文丁卜辭》、高明《武丁時代貞畀卜辭之再研究》、柯昌濟《關於周原卜辭之再探》。

關於甲骨分期，爭論的焦點仍然是“歷組卜辭”的歸屬問題，林澧先生用標型學的方法，全面分析了有關卜辭，認爲自組→自歷間組→歷組一類→歷組二類是一個連續過渡性的系列。無名組（不署卜人名的三期卜辭）→黃組（五期）又是一個連續過渡性系列。根據小屯南地的材料，歷組一類卜辭和賓組記事卜辭同版、歷組二類卜辭和出組卜辭同版。所以自歷間組和歷組不可能是文丁卜辭。這一嶄新的論點，極有力地支持了李

學勤先生的看法，並從不同的角度補充了上屆年會裘錫圭先生提出的論證。爲了把問題引向深入，李學勤、裘錫圭又在爭論中重新闡明了自己的意見。支持這一種觀點的還有李先登先生。持相反觀點的肖楠先生，則從稱謂、人名、事類、坑位和地層關係等幾個方面對武乙、文丁卜辭（即歷組卜辭）進行了全面分析，認爲武乙、文丁卜辭只能定爲第四期，不能歸爲武丁時代。陳煒湛先生、鄒衡先生、許進雄先生在爭論中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材料支持了肖楠先生的意見。關於歷組卜辭的歸屬問題，從首屆年會重新提出以來，直到此次年會爲止，一期說和四期說這兩大派之間，由於觀點針鋒相對，論據充分，說理明確，爭論十分熱烈。

在這次年會上，除上述兩派觀點之外，還有另外的一些意見。周鴻翔先生指出，卜辭中所謂的貞人，並非如董作賓所說是進行貞卜的人物，可能另有所指。他以爲據此進行甲骨斷代有一定困難。趙誠先生從歷組卜辭歸於一期或四期都有一定理由也都存在不少困難，認爲甲骨分期應該重新考慮，最好不要被原來的五期分類所局限，應從現存甲骨的全面分析重新研究入手。徐自強先生指出，爲了更好地進行甲骨分期，要很好地利用考古發掘的地層關係。這些意見，引起與會先生的極大興趣。大家紛紛表示，爲了掌握更多的材料，對甲骨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希望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到小屯發掘出更大數量的甲骨，爲人類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嶄新的貢獻。

大會討論的第二個方面以銅器斷代爲主，兼及兩周金文的有關問題，重要的論文如下：馬承源《金文中月相的研究》、劉啓益《西周金文中的月相與共和宣幽紀年銅器》、倪德衛《西周之年曆》、班大爲《周文王受命與武王克殷之瑞徵》、李學勤《論多友鼎的時代及意義》、于豪亮《陝西省扶風縣強家村出土虢季家族銅器銘文考釋》、巴納《近五十年新獲青銅器銘文彙輯》（樣稿）、王世民《關於金文中的諸侯爵稱》、孫稚雛《金文釋讀中一些問題的商討》、張振林《彝銘中的“日”與“易……旂×日用事”鄙見》。

這一方面討論得最熱烈的有兩個內容：一是月相和西周的年曆問題。一是《多友鼎》的時代。其實，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都與銅器斷代緊密有關。銅器銘文中所記載的月相，歷來有四分說和定點說兩種觀點。自王國維的論證刊行之後，有很長一段時期，學術界大多依從王說。由於銅器出土日多，在推算西周年曆進行銅器斷代時發現種種矛盾，才有更多的學者開始懷疑王說，另作考證。這樣，月相問題上的兩種觀點對立又被重新提了出來。這次大會關於月相問題的爭論，就是這一現實的反映。劉啓益先生提出了“定點月相”的意見，認爲月相是指固定的一天；初吉爲月出的一天，當陰曆初二或初三；既生霸爲月出的次日，當陰曆初三或初四；既望爲月圓的次日，當陰曆十六、十七，有時十八；既死霸即月底，當陰曆二十九或三十。李民先生支持這一觀點。馬承源先生則反對這一意見，而堅持四分說。馬先生首先指出劉啓益先生的方法成問題，即劉先生既認爲周曆是陰陽曆，却沒有以陰陽曆的規則來推算金文。然後介紹了他用計算的方法，全面推算金文月相的相對幅度的情況，指出“在衆多的月相幅度數值中，具有普遍性和有規律性的是一月四分月相或四分月周的幅度”。因而他堅持四分說。戚桂宴先生支持這一觀點，並肯定王國維的四分法是正確的。黃盛璋先生却認爲王國維

的觀點不能成立，並指出初吉、既望不是月相。伍仕謙先生根據兩周銅器中有七十多件的銘文有“正月初吉丁亥”一語，而正月、初吉、丁亥三者相逢之日辰，根據曆譜要七年才有一次，由此推斷初吉似非月相，而為吉日之代號。月相問題雖然討論熱烈，從學術研究的要求來看，尚待深入。

關於西周的年曆，倪德衛先生利用今本《竹書紀年》的材料參照銅器銘文進行推算，排出從公元前一〇五九年到公元前七七一年西周各王在位的年表。同時考定武王克商為公元前一〇四五年。班大為先生則根據《竹書紀年》的記載，從現代天文學的認識並且使用電子計算機對天象加以推算，論證了武王克商在公元前一〇四六年。于豪亮、李學勤、胡厚宣等先生對倪德衛先生利用新的材料和方法所進行的研究紛紛肯定，由此可見大家對西周年曆研究的重視。

大會討論的第三個方面為戰國文字，重要論文有：張頴《中山王響器文字編序》、饒宗頤《曾侯乙墓習器漆書文字初釋》、黃盛璋《戰國銘刻叢考》、殷滌非《“者旨於賜”考畧》、裘錫圭《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馬國權《鳥蟲書研究》。第四個方面為文字考釋，重要論文有：于省吾《釋兩》、曾憲通《說蘇》、戴家祥《辨字小記》、劉宗漢《金文札記三則》。第五個方面包括的內容較多，重要的論文如下：孫常叙《假借形聲和先秦文字的性質》、趙誠《古文字發展過程中的內部調整》、陳邦懷《兩周金文韻讀輯遺》，管燮初《介詞于和於的分析》、張亞初《殷墟都城與山西方國考畧》、許進雄《甲骨文所表現的牛耕》、徐中舒《數占法與周易的八卦》、好並隆司《轅田再考》、鄭良樹《竹簡帛書與校讎學、辨偽學》、史樹青《冰社小記》、嚴學宥《循義定音，循音統形》。

後面這三方面的論文基本上由作者在會上介紹其主要論點和基本證據，雖然爭論較少，但發明和創見頗多，對把古文字研究引向深入很有影響。

本屆年會的學術討論由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會的到會理事組成領導小組集體負責。由各理事輪流擔任執行主席，依次主持會議。到會理事共十三人：于省吾、于豪亮、馬承源、王世民、史樹青、李學勤、張政烺、張頴、胡厚宣、趙誠、姚孝遂、高明、裘錫圭。張頴為理事會召集人，趙誠為秘書長。

年會期間，理事會多次召開會議，總結了一年來的工作，並回顧了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成立以來產生的作用；提出今後工作的重點。大家一致認為：經過四次年會，古文字的教學、研究工作已引起各方面的重視，在培養接班人和出版古文字學書刊方面也取得了初步的成績，今後的任務是推動古文字學的教學、研究工作向提高方面發展。因而提出：根據新的形勢，古文字研究會的年會今後可以採取兩種辦法進行。一是改為二至三年舉行一次，以利於古文字學界有充分時間準備質量更高的論文，促進古文字研究水平的提高；或者仍然每年舉行一次，但每次年會都為專題討論，如今年為甲骨分期，明年為銅器斷代，後年為理論。這樣，參加的人數少一些，討論可以展得開一些，以促進古文字學在專題研究方面的深入。這兩種會議的具體安排，由理事會根據情況決定。

理事會還決定在今後適當的時候舉辦古文字學進修班，每期半年，由古文字研究會理

事分別擔任主要課程的教學工作。理事會還將以理事為主要力量，組織人力編寫《古文字學基礎》、編輯《古文字研究專題論文集》（如《卜辭分期問題論文集》）、《古文字研究資料叢刊》和《出土古文字資料文字編》（如已出的《中山王鐃器文字編》）。

最後，理事會選出胡厚宣先生為下一屆年會的召集人。

本屆年會之所以能按原訂計劃順利召開，一方面是由於年會籌備組全體同志的努力，更主要的則是得到了當地政府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大力支持，特別是由於羅貴波、阮泊生、賈俊、王文章、衛逢祺、劉江、宦鄉、趙復三、夏鼐等領導同志的親切關懷。理事會在聽取了年會籌備經過之後，深為感動，謹代表古文字學界向這些領導同志致以崇敬的謝意。